

安全文化退化、北约威慑东扩 与欧洲安全结构转型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动力*

王弘毅

内容提要:威慑和防御作为北约的核心战略,是维系跨大西洋联盟团结与集体安全的主要支柱。冷战结束后,北约安全战略一度从以威慑为主体转向以防御为主体。随着北约东扩的开启,北约与俄罗斯互动生成的友谊文化逐渐被竞争文化所取代。伴随着克里米亚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文化逐渐让位于敌意文化。安全文化的退化导致北约对俄战略定位也随之调整。北约改变了冷战后在中东欧地区长期维持的延伸威慑战略,开始转向前沿威慑。既有研究集中从美俄关系互动的结构视角解释了北约威慑东扩发生的原因及其动力,但对中东欧国家在其中扮演的安全焦虑扩大器和传播者的角色关注有限。本文尝试以建构主义理论中的安全文化作为解释变量,重点讨论中东欧国家何以影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文化,使北约威慑东扩力度不断强化,从而加速了欧洲安全结构在基本架构和均势重心上的转型。

关键词:安全文化 北约威慑东扩 中东欧 俄罗斯 欧洲安全结构

一 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欧洲安全结构既是地区主要行为体权力博弈的结果,也是一个权力角逐的动态过程。地区安全结构转型通常是在安全危机驱动下发生的。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结构中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对比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新的欧洲安全结构呼之欲出。欧洲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百年变局下中东欧国家的外交选择及中国应对研究”(项目编号:22CGJ031)、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斯拉夫国家社会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2SYLZD041)的阶段性成果。

国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在1990年的巴黎欧安会上通过了《巴黎宪章》，即《新欧洲巴黎宪章》。该文件开启了欧洲安全合作的新时期，构建出欧洲安全的新结构。欧洲各国倡导使用合作安全取代均势安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脆弱的友谊文化，俄罗斯一度和中东欧国家一道加入了北约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然而，由于东西欧之间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它们对北约东扩及此后的威慑力量东进问题存在本质性分歧。其中，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等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怀有强烈的创伤记忆，建构了其俄罗斯强烈的不安全感，进而在摆脱苏联独立后快速转向西方，不遗余力地呼吁北约东扩。中东欧国家这一地缘安全焦虑不仅投射到冷战后历次欧洲地缘政治危机之中，也间接地作用于北约不断东扩的威慑战略，成为影响欧洲安全结构转型不可忽视的动力变量。

学界对于北约威慑战略调整及欧洲安全结构转型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都是从结构层面出发，主要聚焦于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互动。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实主义法则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秩序的国际社会中，大国权力互动往往在形塑地区安全结构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对于理解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困境的生成具有全局性意义。本文的研究目标不是推翻结构互动论的研究结论，而是试图从单元视角对结构互动论的结论加以补充，以期更加全面地理解欧洲以及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困境生成的促发动力及其影响。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美俄博弈的结构性矛盾。陶文钊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多篇研究对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给予充分关注。其中，发表于2018年的一篇论文详细回溯了1993—1997年间美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立场演进，并将1997年北约马德里峰会视为美俄关系不信任的开端。^①他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主题相近的文章中同样将美俄关系持续走低的原因归结为美国欲维持其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与俄罗斯的拒绝承认，并寻求大国地位的复兴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②冯仲平在近期的笔谈文章中对乌克兰危机对欧洲安全结构带来的冲击作了深刻分析。其观点认为，危机不仅导致欧盟与俄罗斯走向全面对立，更是重新激活了北约。作者也论及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敌意的上升。^③王义桅等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违背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及其推动的北约东扩，视为欧洲

① 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77—104页。

② 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载《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4期，第1—3页。

③ 倪峰、冯仲平等：《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47—49页。

安全结构丧失全面性、对等性与约束性,导致俄乌对抗不断升级的深层矛盾。^①从相似视角出发的研究还有:徐若杰对北约战略转型动力的解释同样聚焦于大国权力的互动层面,如联盟对俄强硬政策的共识程度、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战略平衡考虑、美欧矛盾程度以及美欧亚利益的差异性。^②韩克敌近期的研究成果也将美俄关系演变作为欧洲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③上述几项研究为学界理解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结构性动因提供了深刻见解,但总体上对中东欧国家在推动北约东扩以及之后的北约威慑东扩进程中的影响没有做较多论述。

另外,曾晨宇和许海云的相关研究剖析了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在欧洲安全结构塑造中扮演的不可替代性角色及其政策实践,但并未论及北约东扩及其威慑东进的动力。^④高歌在与本文研究视角相近的一篇文章中不仅分析了美国、北约、欧盟和俄罗斯等行为体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塑造影响,同时也特别指出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对美欧俄三角关系带来的反作用力。尽管这种反作用力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三角关系的互动格局,^⑤但值得一提的是,冯绍雷在其2024年的新著中有少量笔墨论及北约战略东进中的中东欧国家角色。^⑥此外,朱晓中的相关研究也有论及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焦虑,及其加入北约的动机。^⑦上述研究无疑为本研究的切入论点和研究视角提供了辅证。囿于篇幅,以上综述无法穷尽北约东扩至今的所有相关研究,仅简要梳理并归纳了近十年来有关北约威慑东扩动力及其如何影响欧洲安全架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与国内学界解释有所不同的是,国际学界对北约威慑东扩动力及其影响的探究更偏好于结构—单元层面的互动分析,同时也有较少学者关注到了中东欧国家在推动北约威慑东扩进程中扮演的制动角色。囿于篇幅,本文仅选取了近五年来与本研究问题相关度较高的几篇作为代表。譬如,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妮·冯·赫拉茨基(Stéfanie von

① 王义桅、段愆农:《欧洲安全秩序重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历史启示》,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2期,第73-101页。

②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59-82页。

③ 韩克敌:《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36-52页。

④ 曾晨宇、许海云:《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北约角色》,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3期,第111-132页。

⑤ 高歌:《从美苏之间到美欧俄之间——1989年后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战略与大国关系的互动》,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第42-54页。

⑥ 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00页。

⑦ 朱晓中:《双东扩的政治学——北约和欧盟扩大及其对欧洲观念的影响》,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第2期,第54-55页。

Hlatky)通过追溯北约核共享机制的建立背景和演进历程,分析了北约核威慑政策形成的因素。文章通过研究北约核共享机制自成立以来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方式,指出北约核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以增强威慑和联盟凝聚力为目标。为了检验北约威慑政策演化的动力机制,文章创建了一个以“联盟压力、威胁评估、精英共识、民众对核共享的支持程度”为自变量的理论模型。^① 丹麦学者玛丽亚·梅尔克苏(Maria Mälksoo)主要解释了北约重新动员其现代延伸威慑力量,以强化联盟凝聚力的动因,并以北约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建立前沿军事存在的背景和进程为案例,重点分析了北约延伸威慑东扩与结盟威慑的演进态势及其动机。^② 虽然,上述研究注意到单元层面对于安全结构的反作用力,但并未将北约威慑东扩的动力、进程及其对欧洲安全结构转型产生的影响相联结。除上述研究外,亦有学者关注到以波兰为主要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推动北约威慑力量东进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力辅证。如波兰学者雷沙尔德·济恩巴(Ryszard Zięba)在其专著中专门论及了波兰通过与美国和欧盟密切合作,不仅扮演了推进西方民主东扩的旗手,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动北约战略力量东移,从而加速了欧洲安全军事化。^③ 与此视角相似的一项研究来自法国学者克里斯泰勒·卡尔梅尔斯(Christelle Calmels),其研究重点是北约东翼的九个中东欧国家,即布加勒斯特九国倡议成员国。该研究以为影响北约决策进程而专门建立的非正式安全政策协调论坛(布加勒斯特九国倡议)为例,探究了中东欧国家如何影响北约决策这一问题。^④ 该项研究再次印证了中东欧国家在驱动北约威慑东扩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过,上述两项研究并未嵌入理论分析,也未对欧洲安全结构的影响作出联动分析。

一言以蔽之,中东欧国家在促使克林顿政府改变北约不东扩战略,推动北约威慑持续东扩议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这一角色也间接使得该地区国家在美俄(北约与俄罗斯)与欧俄权力互动中的地缘政治权力得以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中

^① 该模型通过后冷战时代(1991—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2014—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2022年至今)三个时期的案例追踪与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核共享机制在高威胁环境中更容易被动员,北约威慑趋势和核共享机制的活力、内部合法性取决于各成员国精英的外部威慑感知和共识程度。See Stéfanie von Hlatky and Émile Lambert-Deslandes, “The Ukraine War and Nuclear 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2, 2024, pp.509–530.

^② Maria Mälksoo, “NATO’s New Front: Deterrence Moves Eastwar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2, 2024, pp.531–547.

^③ Ryszard Zięba, *Poland’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Springer Cham, 2020, pp.173–175.

^④ Christelle Calmels, “NATO Enlargement to the East: Bucharest Nine As a Game-changer within the Alliance, Centre for Conflict, Security, and Societies (Cardiff University), December 2020, pp.1–13.

东欧国家作为分析单元纳入美国(北约)与俄罗斯的互动结构,以“安全文化—北约威慑东扩—欧洲安全结构转型”为解释框架,旨在探究中东欧国家在北约威慑东扩进程中的驱动作用,及其对欧洲安全结构转型造成的可能性影响。

二 分析框架:安全文化、北约威慑东扩与欧洲安全结构转型

从建构主义理论的“文化(观念)—身份—利益”互动关系视角来看,欧洲安全结构内部既包含物质性要素,即基于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权力互动,也包含观念性要素,即不同国家之间信奉以及彼此共享的安全观念,即文化结构。在物质维度层面,苏联解体意味着权力对峙的结束,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原因是冷战结束并未弥合和消解西欧与东欧以及俄罗斯之间所共享的安全观念的裂痕。这一裂痕根植于数百年来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累积的历史积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恐惧症,导致东欧、西欧与俄罗斯互动形成的安全文化存在显著差异。

(一) 核心概念界定

秦亚青将安全文化界定为:“一个社群成员对于什么是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获得和保障安全的共同知识。同理,在国际社会中,安全文化指的是作为主要成员的国家在安全威胁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共识”。^① 温特提出了国际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安全文化,分别是敌意文化主导下的霍布斯文化;竞争与合作主导下的洛克文化;友谊和合作主导下的康德文化。霍布斯式文化强调的是一种敌意文化,认为他者对自我构成了生存上的真实威胁,无论这种威胁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洛克文化中的角色结构是竞争,而不是敌对。与敌意结构不同的是,竞争结构下国家对他者的威胁感知较低,并且双方彼此抱有的共有期望是承认主权,因而不谋求征服和统治对方。^② 康德文化的角色结构特征是友谊。在友谊文化结构下,国家的角色期望有两种:其一,非暴力原则,即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途径解决争端;其二,互助原则,即任何一方的安全遭受第三方威胁,双方将共同作战。基于此规则产生了多元安全共同体,即由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种真切的保证,即共同体成员不会兵戎相见,而是主张以其他方式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③ 由于安全文化具有社会属性,是在国际互动实践中

① 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第8页。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274页。

建构起来的。因此,安全文化一旦被建构起来,将在互动的国际社会群体中形成彼此共享的安全规范(共有期望和认知),这种规范同时也将对社群内的成员安全威胁认知和行为产生形塑作用。此外,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施动者(国家)不仅可以通过有意识的互动实践建构上述三种共有安全文化的任何一种,也可以在互动实践中解构被建构起来的安全文化,进而产生安全文化的退化效应,即从高一级安全文化退化到低一级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退化同时标志着国际社会群体内安全关系的不断恶化,甚至是安全困境的生成。

而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困境生成的直接动力就是北约威慑战略的持续东扩。在国际关系学中,威慑意指一种军事战略,即一国有效地利用报复威胁来阻止敌国的攻击。防御意指防御攻击或伤害的能力。对于北约而言,威慑与防御两者呈相辅相成关系。强大的威慑能力是防止威胁或危险发生的必备前提,而防御能力则是增强威慑战略有效性的必要保证。因此,北约的威慑战略往往是与防御战略同步推进的。本文所论及的威慑东扩既包含了延伸威慑力量的向东推进,也包括前沿威慑力量的东进与强化。据此定义,北约东扩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延伸威慑力量东扩的一个阶段。“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和前沿威慑(Forward deterrence)”从威慑战略引申而来。其中,延伸威慑是指以核武器和其他战略性力量为支撑,将威慑战略力量的打击目标与范围从防止敌方攻击其本土延伸到其友邻或盟国。正如威慑理论家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L. Powell)所指出的,延伸威慑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以威胁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从而说服潜在威胁者不对其盟国进行武力打击。^① 前沿威慑,即在前沿地区部署威慑力量,强调的是将战略威慑力量部署从本土转移到敌对阵营的前沿地区的友邻或盟国,以提升威慑战略的力度。^② 本文中论及的前沿威慑就是将北约战略威慑力量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前沿地区转移。

冷战结束后,以波兰和立陶宛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非理性安全焦虑在根源上是长期的恐惧症作祟。^③ 这种带有特定目标指向的安全焦虑情绪在学界被冠

^①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

^② 北约在联盟东部的军事存在是其加强威慑和防御态势的关键部分,近年来,北约的东部前沿军事存在得到了加强,反映了欧洲—大西洋地区新的安全现实。See “NATO’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East of the Alliance,” NATO, July 8,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36388.htm.

^③ 亦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炮制“俄罗斯威胁论”,试图利用新欧洲对俄罗斯的地缘恐惧,以及新老欧洲对俄观念与政策的分歧,达到对外遏制俄罗斯、对内掌控欧洲的战略目标。不过,该学者仍将分析视角放在美俄大国博弈之下。参见初智勇:《俄罗斯安全观的嬗变、延续与回归》,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0页。

以“俄罗斯恐惧症”(Russophobia)之名,^①泛指对俄罗斯的恐惧或厌恶情绪。^②亦有学者将“恐俄症”定义为对俄罗斯的“非理性恐惧”(Irrational fear of Russia)。^③其主要症状包括由特定物体、事件或情况所诱发的过度、不合理、持续的安全焦虑。^④这种基于恐惧症引发的非理性安全焦虑周而复始地出现在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认知中,使得加入北约前后的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根深蒂固的警惕与猜疑,无法像美国和北约西欧盟友那样对俄罗斯带着合作的善意重建友谊文化。

(二) 欧洲安全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安全文化退化驱动北约威慑东扩

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看,冷战结束以来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界分为三类文化结构,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欧洲安全结构和趋势取决于基于上述三种文化中所对应的敌意、竞争和友谊文化哪一种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往往会在对应的文化结构压力下将这种角色内化于它们的身份和利益之中。^⑤

借助上述三种文化结构的核心特征以及支配法则,本文将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互动建构起来的安全文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友谊文化主导下的友谊与竞争相互交织的安全文化(1991—1999年);第二阶段是竞争文化主导下的竞争与友谊相互交织的安全文化(2000—2021年);第三阶段则是由敌意文化所支配,始于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此次危机将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从中东欧国家扩展到北约大多数成员国。这三种结构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其生成机理和转化动力则取决于施动者之间的观念互动。从欧俄安全困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来看,现实主义理论在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困境的恶化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对于安全困境的起源相对解释力有限。如上文分析,恐惧症是导致中东欧国家迫切希望加入北约和欧盟,并极力主张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的重要驱动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恐惧症根植于冷战时期,乃至数百年来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及其前身的关系互动。

^① “Russophobia,”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July 19, 2024,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Russophobia>.

^② 相关主题的讨论与研究可参见[美]雷蒙德·塔拉斯:《波兰的长期恐惧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第22页。

^③ Glenn Diesen, *Russophobia: Propagand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2022, pp.1-13.

^④ Howard E. LeWine, “Phobia,” 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Website, May 7, 2024,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a_to_z/phobia-a-to-z.

^⑤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55页。

正是由于这种已经根深蒂固的内化了的俄罗斯观(对俄罗斯的恐惧心理)建构了中东欧国家的反俄身份和利益。

中东欧国家反俄身份的建构使其在推动北约东扩发生,及其之后的北约威慑力量东扩进程中扮演了安全焦虑扩大器和传播者角色。这种角色显著地体现在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结构的历次危机之中。如果说第一次危机始于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的几次重要地缘政治危机分别是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与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上述几次危机中,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北约战略新概念的调整以及威慑战略的东扩进程。譬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直接导致北约在中东欧地区威慑战略的转向,即从长期以来的延伸威慑转向前沿威慑。2017年北约开始在中东欧国家首次部署前沿军事存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则将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从中东欧国家扩展到北约大多数成员国。此次危机对欧洲安全结构产生的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是敌意文化压倒竞争和友谊文化,在欧洲安全结构中居于主导性地位。

三 欧洲安全文化退化与北约威慑东扩进程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中施动者有意义的互动,及其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有理解和期望(即共有知识),将建构由共有知识(观念)分配所形成的结构。结构一旦形成将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影响欧洲共有安全观念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两组变量:一组是结构层面的美国或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互动;另一组则是单元层面的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互动。在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互动之中,囿于地缘毗邻性、创伤记忆、国家能力等差异性,冷战后初期迫切希望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国家成为导致北约与俄罗斯关系逐渐恶化的重要变量。中东欧国家的北约化进程不仅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环境,也深刻影响着北约大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①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恐俄症”使得加入北约之后的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的军事行为异常敏感。换言之,中东欧国家在北约大国与俄罗斯之间扮演了安全焦虑扩大器和传播者的角色,使得有关俄罗斯威胁论的叙事周而复始地出现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议程之中,从而间接地助推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安全文化的退化。安全文化的退化驱动北约

^① Joanna Kaminska, “Shaping EU Policy Toward Russia? The Veto Case,” in Joanna Kaminska, *Poland and EU Enlargement: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105-139.

威慑力量不断东移。

(一)从“友谊为主竞争为辅”转向“竞争为主友谊为辅”(1991—1999年)

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与俄罗斯的安全互动在冷战后初期是在信任的氛围中展开的,双方相互释放了大量善意,初步建立起友谊文化。在这种文化结构下,彼此以朋友身份相处,采取合作政策共同应对欧洲的安全问题。然而,随着北约向东扩张政策的重新启动,致使北约与俄罗斯的战略互动逐步走向不信任和战略猜疑的竞争文化。个中缘由除了学界既有研究中常常论及的美国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外,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恐惧观念,成为驱动美国改变北约不东扩政策的重要变量。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提出,现实主义法则支配下的美苏(俄)均势安全互动逐渐让位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合作安全互动。在此背景下,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西欧盟友在冷战后初期整体上对于北约东扩的动机并不强烈。这在美国战略界以及相关历史档案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证据。如冯绍雷在其著作中披露了一段发生在2001年的与布热津斯基的对话,当问及美国推进北约东扩的背后考虑时,布热津斯基表示:首先这是欧洲——主要是中东欧国家——而不是美国提出的动议,同时美国也应该担当责任。^①与此同时,1992年,北约秘书长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ired Wörner)访问了莫斯科,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Руслан Имранович Хасбратов)谈到俄罗斯和北约的共同利益时,指出北约对帮助俄罗斯“繁荣”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的未来欧洲安全愿景与俄罗斯的愿景相呼应:“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新安全环境的欧洲。它将是一个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的统一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第一大支柱是赫尔辛基进程,第二大支柱是欧洲共同体,第三大支柱是北约”。^②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则于1993年10月22日在莫斯科向叶利钦保证,“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旨在将俄罗斯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在内,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成员名单。^③1994年6月,俄罗斯成为第一批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国家。^④1995年5

① 冯绍雷:《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第100页。

② “Meeting of the Chairman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I. Khasbulatov with Mr. Woern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ebruary 25, 1992,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31797-document-1-memorandum-conversation-between-nato-secretary-general-manfred-woerner>.

③ “Secretary Christopher’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Yeltsi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October 22, 1993,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16380-document-08-secretary-christopher-s-meeting>.

④ “NATO-Russia Relations: The Background,” NATO, March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4/pdf/2003-NATO-Russia_en.pdf.

月,北约秘书长在接受俄罗斯加入单独伙伴关系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under 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时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俄罗斯和北约有能力成为有价值的朋友,永远摆脱过去不信任和猜疑的历史”。^①1997年,双方签署《北约与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础文件》,重申双方不再互为敌手,将加强在欧洲安全、维和、军控、反恐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并设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隐忍了北约的首轮东扩。另外,1991年北约《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对其所面临的新战略环境评估之后,认为“1989年以来,中东欧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从根本上改善了北大西洋联盟实现其目标的安全环境。联盟成立四十年来所关注的整体性、大规模和潜在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②

冷战终结在形式上结束了欧洲的地缘分裂,但也使得中东欧地区再度成为夹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导致这些国家大多怀有强烈的地缘安全焦虑感,迫切希望转向并融入西方,以改变这种不稳定的地缘安全环境。出于推动俄罗斯转型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考量,冷战后初期中东欧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较之冷战时期有所下降。原因是一个走向转型道路且倒向西方的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和全球领导力而言有着更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反,中东欧曾作为美国对苏东阵营展开和平演变的楔子地位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焦虑更加强烈,为此不遗余力通过多层渠道开展对美游说,成为驱动美国克林顿政府改变北约不东扩立场的重要因素。

转型初期,中东欧国家在主客观上都需要与俄罗斯保持接触,以寻求一个相对睦邻友好的地缘安全环境。然而当苏联军队陆续撤出东欧之后,部分国家的安全政策随之调整。如在1990年1月,时任波兰外长克日什托夫·斯库比谢夫斯基(Krzysztof Skubiszewski)在华沙条约组织尚未解散的背景下就访问了北约总部。9月,北约秘书长首次访问波兰。同年12月20日,北约开放与前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接触,邀请他们加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NACC)。另外,波兰总统瓦文萨于1993年9月1日向北约秘书长发出正式信函,宣布加入北约是波兰的优先事项。波兰犹如鼓动北约东扩的旗手,为此奔走呼喊,不遗余力。即使在叶利钦表达了强烈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背景

^① “Remarks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at The Acceptance of the Russian Partnership for Peace Individual Partnership Programme and the Areas for Pursuance of a Broad, Enhanced NATO/Russia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yond PFP,” NATO, May 31, 1995,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1995/s950531a.htm>.

^②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1991),” NATO, November 7, 199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847.htm.

下,波兰联合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独立成为两个国家)和匈牙利组建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和北约内部的游说依然取得了成功。在1991年集团成立伊始,三国就发表了寻求与北约发展紧密且制度化合作的联合声明。为此,北约成立了旨在加强其同前华约国家合作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这一制度化合作作为后来北约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奠定了基础。^①

另一个重要的压力团体是波兰裔美国人大会(Polish American Congress),该组织在推动美国改变对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态度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②1993年,波兰裔美国人大会曾组织甚至号召全美的波兰人或波兰侨民通过电话、电报和信函等各种形式,呼吁美国白宫开启北约东扩大门。作为对美国波兰人大会诉求的回应,克林顿政府在同年12月6日秘密召集了在美国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团体,就北约是否应该东扩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激烈辩论。此次谈话产生了一定效果。次年1月6日,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在密尔沃基发表了一个演讲,虽然并未对是否改变“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做出具体表态,但特别强调了中东欧国家安全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几个月之后,他又相继会见了在美的乌克兰人代表和波、匈、捷、斯代表。变化出现在克林顿1994年1月的欧洲之行。克林顿首先在布鲁塞尔参加了北约领导人峰会,正式确立了与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同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合作方案;随后赶往布拉格,会见了维谢格拉德四国领导人,并向他们通报了布鲁塞尔峰会的决议。但该决议遭到四国领导人的质疑和不满,尤其是波兰方面。四国同意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但前提是这是成为北约正式成员的第一步。克林顿默许了四国的政治诉求。会谈结束后,克林顿在布拉格城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北约是否会接纳新成员,而是何时以及如何接纳新成员”。^③1998年4月30日,美国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批准捷克、匈牙

^① Donald E. Pienkos, “Poland, the Issue of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The Polish Review*, Vol.40, No.2, 1995, p.182.

^② 1993年11月,波兰裔美国人大会主席爱德华·莫斯卡尔(Edward Moskal)致信美国众议院议员保罗·西蒙(Paul Simon)表达了对于俄罗斯愈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以及对和平伙伴关系不充分的强烈关切。信函指出,和平伙伴关系既不是帮助中东欧国家抵抗潜在侵略者的威慑力量,也无法给它们带来关于实现欧洲安全的可信赖的前景。他还借战后雅尔塔会议中波兰被大国出卖而遭受的种种灾难性经历来表示,波兰希望美国不要再将与大国的伙伴关系建立在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基础上。See Donald E. Pienkos, “Poland, the Issue of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Polish American Congress,” pp.189-192.

^③ “The President’s Luncheon Plenary Meeting with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f Poland, Hungary, Slovakia and the Czech Republic,”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January 12, 1994,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16384-document-12-president-s-luncheon-plenary>.

利和波兰加入北约的计划。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于1999年3月正式加入北约。^①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裔美国人大会议作为在美国的一个政治游说群体,代表了中东欧国家反俄的民族主义声音。该群体之所以能影响克林顿政府的对俄战略转向,与其在美国国内的反俄政治盟友的支持密不可分。事实上,美国自冷战以来就长期存在一个强大的反俄游说团体。它包括三个主要群体:“军国主义鹰派”“自由鹰派”和中东欧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鹰派的游说目标是保持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其倡导的实现路径是以实力对抗冷战后美国霸权可能出现的挑战。自由鹰派将巩固美国的“民主样本”作为游说目标,其倡导的实现路径是以输出民主价值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制度性领导。不过,在具体实践上,这一派别往往支持军国主义的外交政策议程。譬如,自由主义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通常和保守派组织一样强硬。进一步的证据是,自由鹰派还曾签署由保守派组织的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公开信。^②该公开信由成立于1997年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发起。该智库的25个创始人中有10人后来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府中任职。有美国学者指出,新保守主义者利用PNAC的影响力甚至“劫持”了美国政府。^③而美国的中东欧民族主义群体则希望美国始终保持强大,并有能力阻止俄罗斯的复兴。该群体将俄罗斯视为帝国式国家,对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的前景感到悲观,在推动美国霸权议程时倾向于站在军国主义鹰派一边。它们认为,保护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是防止恢复“新苏联帝国”的重要保证。比较来看,在反俄游说团体中,军国主义鹰派的力量和影响力是最强大的。自由鹰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民主言论经常被军事鹰派利用。^④中东欧民族主义群体对俄罗斯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使其与前两者形成了反俄统一阵线,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并且,这种俄罗斯恐惧症恰好为反俄鹰派对内政治动员以及团结外部盟友提供了政治武器。

(二)从“竞争为主友谊为辅”转向“竞争为主敌意为辅”(1999—2021年)

^① Bill Clinton, “Strengthening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February 26, 1999, <https://clintonwhitehouse5.archives.gov/WH/EOP/NSC/html/nsc-05.html>.

^② Andrei P. Tsygankov, *Russophobia: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34-35.

^③ Kenneth Christie e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21st Century*, Routledge, 2008, p.21.

^④ Andrei P. Tsygankov, *Russophobia: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36-37.

1999年,美国主导下的北约绕过联合国授权悍然对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伙伴国南联盟进行了轰炸,加之该年北约正式接收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为正式成员国,破坏了冷战结束后北约与俄罗斯构建起来的脆弱的友谊文化。陶文钊就将1997年召开的北约马德里峰会视为美俄关系不信任的开端。^①从1999年到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经历了数次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具有标志性的是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历经数次危机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互动的安全文化整体上呈退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在2014年之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除了竞争之外,尚能重新回到有限合作轨道上。譬如在2009年的斯特拉斯堡峰会上,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了他们对北约—俄罗斯伙伴关系的承诺,认为这是促进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的战略要素。彼时的与会各国宣称:“尽管北约与俄罗斯目前存在分歧,但俄罗斯作为北约的合作伙伴和邻国对北约来说尤为重要,北约和俄罗斯仍然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②因此,这一时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文化可以概括为从“竞争为主友谊为辅”转向“竞争为主敌意为辅”的安全文化。

从演化过程来看,第一次危机是发生在2008年10月的俄格冲突。此次冲突不仅导致美俄关系重启受挫,更是刺激了中东欧国家的敏感神经,使其针对俄罗斯的恐惧情绪再度激化。一个显著证据是,将此次冲突定性为侵略性质的北约盟国主要来自中东欧地区。譬如,爱沙尼亚议会谴责俄罗斯联邦对格鲁吉亚的“军事侵略”,并将俄罗斯的行动与纳粹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攻击相提并论。议会敦促国际社会“尽一切可能援助格鲁吉亚”,并支持“格鲁吉亚加速加入北约”。^③拉脱维亚总统和议会也将此次冲突定性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呼吁北约成员国做出回应,以加强和保障俄罗斯所有邻国未来的安全。^④波兰的反应最为激烈。它通过敦促欧盟做出紧急且充分的反应,在时任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倡议下,在2008年8月召开了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波兰还动用其在欧盟理事会重大决议中的一票否决

^① 1997年马德里峰会决定邀请波、匈、捷进行入盟谈判,打开了美俄关系中的潘多拉盒子。参见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第77—104页。

^② “Strasbourg-Kehl Summit Strengthens Transatlantic Link and Looks at NATO’s Future Challenges,” NATO, April 4, 200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52845.htm.

^③ Ene Ergma, “Statement of the Riigikogu on Military Aggress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Georgia,” Riigikogu, August 12,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22153605/http://www.riigikogu.ee/index.php?id=50828>.

^④ Gundars Daudze, “Statement On Russia’s Military Attack on Georgia,” The Saeima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August 14, 2008, <https://www.saeima.lv/arhivs/en/pazinojums.pdf>.

权,通过否决欧盟—俄罗斯战略伙伴协定谈判的重启,来威胁欧盟在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安全政策上采取统一政策。^① 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在声明中表示:对格鲁吉亚内政的任何干涉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此类行动如果愈演愈烈,都可能导致悲剧性后果。此外,卡钦斯基与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总统还在第一时间访问了第比利斯,表达了对格鲁吉亚的声援。他在访问时发出警示:“今天是格鲁吉亚,明天就是乌克兰,然后就是波罗的海国家,再然后可能就要到我们波兰了”。^②

中东欧国家强烈的安全焦虑不仅加速了美国在欧洲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也进一步加快了北约威慑东扩进程,导致北约—俄罗斯脆弱的信任关系出现裂痕。美波两国历经18个月久拖不决的导弹部署协议最终达成共识,北约将在波兰领土上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在捷克共和国部署跟踪系统。此前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是波兰要求美国须用爱国者导弹强化本国安全,作为换取美国在波军事基地享受治外法权的条件。^③ 双方对此均持保留态度,波兰担心无法掌控美国在该基地的军事进展,美国则担忧答应波兰安全需求会过分激怒俄罗斯。^④ 不出所料,俄方对美波导弹协议表示愤怒。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俄高级将领阿纳托利·诺戈维岑(Anatoly Nogovitsyn)表示:“波兰部署该系统后,将使自己百分之百暴露在遭到打击的风险之中。”^⑤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换届之后,奥巴马政府调转了全球战略重心,对俄采取了重新接触政策,并放弃了前任政府在中东欧地区的远程弹道导弹部署计划。美国战略转向引发波兰和捷克政府的强烈担忧,两国高层对美国改变双方历经六年谈判达成的既定导弹部署计划深表失望,并表示将坚持要求美国履行向北约盟国做出的承诺。^⑥ 随

^① Agnieszka K. Cianciara, “The European Policy of Donald Tusk’s Government,” *Fundacja Instytut Spraw Publicznych, Analyses & Opinions*, No.8/93, April 2009, p.2,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502013612/http://www.isp.org.pl/files/630252560327361001238678141.pdf>.

^② “11 Years Since Landmark Speech by Polish Leader in Georgia,” *Polskie Radio*, August 12, 2019, <https://www.polskieradio.pl/395/7785/artykul/2353833,11-years-since-landmark-speech-by-polish-leader-in-georgia>.

^③ “Poland and US Sign Missile Defence Deal,” *The Guardian*, August 20,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ug/20/poland.usa>.

^④ 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表示:“我对治外法权问题持谨慎态度,我不会隐瞒这一点。”不过,波兰却是美国北约欧洲盟国中唯一一个对在其本土部署反导系统持热情态度的国家,这无疑成为美国乃至北约弹道导弹系统落地的重要影响因素。See “Poland Reluctant to Give America Sovereignty Over Missile Base,” *The Guardian*, July 27,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jul/27/usa.poland>.

^⑤ Jon Swaine, “Condoleezza Rice to Sign Missile Defence Deal with Poland,” *The Telegraph*, August 20, 2008,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poland/2589060/Condoleezza-Rice-to-sign-missile-defence-deal-with-Poland.html>.

^⑥ “Obama Abandons Missile Defence Shield in Europ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7, 20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sep/17/missile-defence-shield-barack-obama>.

后在 2009 年 7 月,来自中东欧八个国家的 22 名前政要、外交官、社会意见领袖联名致信奥巴马,强烈呼吁美国“复兴”北约,使其成为美欧之间最重要的安全纽带。他们还呼吁奥巴马政府不要放弃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希望美国能够继续重视该地区,并一如既往为之提供安全保证。联名作者一致认为俄罗斯的系列行为已经违反《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巴黎宪章》的核心原则,并破坏了欧洲大西洋伙伴理事会成员国的领土完整,但北约却选择了袖手旁观,这使得他们深感不安。^① 为了安抚盟友,2009 年 9 月 17 日,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以替代前任政府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此后,在 2010 年,北约盟国决定提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履行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核心任务。^② 2012 年,北约发布了一份威慑和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强调了弹道导弹的扩散日益引起联盟的关注,并对联盟的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③ 与北约东扩原因相似的是,推动这一议程实现的主要动力之一亦来自中东欧国家强烈的安全焦虑及其诉求。

推动北约在中东欧地区的安全战略从延伸威慑转向前沿威慑的直接动力是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发生。在此之前,北约长期秉持的政策立场是避免在中东欧前沿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防止疏远或激怒俄罗斯。^④ 此次危机导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恐惧情绪骤增,故而强烈呼吁北约强化在前沿地区的军事防御和威慑部署。为安抚盟友并夯实北约集体安全防御信誉,北约在 2016 年华沙峰会上做出向上述四国部署多国轮换部队的决定,2017 年北约轮换部队正式进驻。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显示北约威慑东进加速与波兰右翼政府的政治游说紧密相关。2015 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波兰政府的游说目标从强化在北约和欧盟框架下的区域合作转向支持与被视为波兰安全的主要保证者——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波兰政府分别与共和党

^① 包括前罗马尼亚总统埃米尔·康斯坦丁内斯库(Emil Constantinescu)、时任立陶宛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库斯(Valdas Adamkus)、前爱沙尼亚总理马特·拉尔(Mart Laar)、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时任捷克外交部长卡雷尔·施瓦岑贝格(Karel Schwarzenberg)、前斯洛伐克总统米哈尔·科瓦奇(Michal Kováč)、前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前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等,参见“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KK ICDS, July 15, 2009, <https://icds.ce/en/an-open-letter-to-the-obama-administration-from-central-and-eastern-europe/>。

^② 在 2010 年里斯本北约峰会上,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意以整体方式解决防空和导弹防御问题,即开发北约综合防空反导系统(NATINAMDS),包括发展领土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在此之前,北约的弹道导弹防御工作重点是战区弹道导弹防御(TBMD),即旨在保护部署到战区的武装部队的弹道导弹防御。参见“Ballistic Missile Defence,” NATO, August 1,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9635.htm。

^③ “Deterrence and Defence Posture Review,” NATO, May 20, 201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87597.htm。

^④ Maria Mälksoo, “NATO’s New Front: Deterrence Moves Eastward,” pp.531–547.

政界关系密切的 BGR 政府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和独立游说公司帕克策略公司 (Park Strategies) 签署了合同。譬如,自 2016 年开始,帕克策略公司在美国国会中的游说代表波兰政府的利益。其游说目标主要包括:支持波兰的安全倡议以及发展北约在波兰的基础设施;塑造媒体上双边关系的积极形象,特别是有关中东欧安全,以及向美国媒体解释波兰官方和商界的政策;确保 2016 年北约华沙峰会前美国和波兰政策的协调;协助深化美国和波兰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间的合作;在大西洋理事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理事会各层级组织会议;与美国各政府部门展开对话与合作,支持波兰于 2015 年发起的“三海倡议”。^① 事实表明,共和党人特朗普上台首年就访问了波兰,并出席了“三海倡议”领导人峰会。并且,该届政府还于 2019 年将 1000 名驻德美军调到波兰,不断扩大在波兰的军事部署规模。

与此同时,根据华沙峰会的决定,将由美国担任驻波北约多国战斗群的框架国。根据美国的欧洲再保证倡议,美国陆军第 4 步兵师第 3 装甲旅战斗队自 2017 年 1 月开始进驻波兰,随后将分散到该地区其他盟国。这批部队将在波兰等国进行为期 9 个月的训练和演习,之后将由同等规模的部队替换。^② 此外,2016 年 5 月,美国在波兰西北部瑞兹科沃 (Redzikowo) 开始建设 SM-3 导弹防御基地,这是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为了响应波罗的海国家于 2015 年提出的关于扩大在其领土上的北约部队的要求,华沙峰会还决定将部署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战斗群规模扩充了约 1000 人。罗马尼亚在华沙峰会之前曾提出加强北约在黑海地区存在的倡议,形式是派遣多国部队和黑海舰队,虽然这一提议仅获得相对有限的支持。但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北约大幅扩大了在罗马尼亚的常规军事存在,并升级了空中防御系统。^③

(三)从“竞争为主敌意为辅”转向“敌意支配”(2022 年至今)

北约对俄威胁认知达成广泛共识的转折点始于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原因是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恐惧程度以及反抗力度在此次危机之后攀升到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在北约东翼的所有中东欧国家中,仅有塞尔维亚、匈牙利和波黑三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持中立立场,其余中东欧国家均持不同程度的

^① Valery Konyshev and E. M. Skvortsova, “Foreign Lobbying as an Instrument of Defense Cooperation between Po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ltic Region*, Vol.12, No.2, 2020, pp.9-12.

^②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Poland, “American Armored Brigade Combat Team in Poland,” August 31, 2017, <https://pl.usembassy.gov/abct/>.

^③ Justyna Gotkowska, “NATO’s Eastern Flank—A New Paradigm,”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July 13, 2016,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6-07-13/natos-eastern-flank-a-new-paradigm>.

批评和谴责立场。其中,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充当了挺乌反俄的急先锋。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驻华沙办事处在2023年9月举行的北约东翼安全问题的政策对话,折射出东西欧之间对俄罗斯威胁感知的本质差异,以及对威胁回应的坚定程度。在此次政策对话中,波兰权威智库东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斯蒂娜·戈特科夫斯卡(Justyna Gotkowska)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使得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瑞典、芬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识到欧洲的安全局势已经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这种感知在东西欧之间存在显著的温差。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威胁是切肤之痛,甚至可能是生死攸关。而对于西欧国家而言,这场危机更多的是一次深刻影响或改变欧洲安全局势或结构的地区战争。相比于中东欧国家军事开支比例的大幅提高,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对此显得更为谨慎。^①

这种威胁感知差异进而导致北约东欧、西欧盟友对增强北约前沿威慑的动机与紧迫程度的认知不一。如果说2009年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在第比利斯的威胁警示只是一种未证实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话,那么随着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发生,再到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全面爆发,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波兰发出的安全预言。加之中东欧国家作为北约东部前沿,此次危机使得该地区国家对北约威慑东扩战略调整的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升。譬如,2022年北约出台的强化威慑和防御能力的新战略概念文件^②集中反映了中东欧国家的安全焦虑与诉求。它对北约面临的战略环境做了评估。评估报告数次提及俄罗斯,将其称作北约成员国安全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且直接的威胁”。新概念文件强调将集中在北约东翼,构筑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地区的更强大的威慑与防御阵线。^③此外,2023年的北约峰会在东翼前线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此次峰会除了再次确认北约当下的主基调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最紧迫挑战这一首要任务之外,还确认将进一步增强在中东欧地区的前沿威慑与防御部署。^④

北约威慑力量的重心向东转移,也使东部盟国的安全担忧和威慑理由更多地成为

^① Joanna Maria Stolarek, “Credible Partner on NATO’s Eastern Flank—Poland’s New Role in Security Policy,” HEINRICH-BÖLL-STIFTUNG, September 29, 2023, <https://pl.boell.org/en/2023/09/29/credible-partner-natos-eastern-flank-polands-new-role-security-policy>.

^② 战略概念是指导北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1991年,北约罗马峰会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此后,北约多次更新战略概念。

^③ 《北约2022战略概念》(中文版), 2022年,第2页,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chi.pdf。

^④ “2023 NATO Summit,” NATO, June 28, 2023, <https://www.nato.int/eps/en/natohq/216570.htm>.

北约的集体关注。北约决策层开始普遍认为,在2014年之前,波罗的海和波兰代表对俄罗斯的意图或许怀有历史性偏见,但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中东欧国家的“俄罗斯恐惧症”在北约内部引发了广泛的同情与共鸣。^①这也使得波罗的海和波兰的安全担忧已成为北约主流威胁评估的一部分。正如北约波罗的海地区高级代表所说,“以前不听我们话的人,现在开始听了”。^②

受到敌意文化结构的敌人角色建构与驱动,美俄、欧俄(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都将长期嵌套在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的文化结构中,其带来的国家行为偏好表现出四个特征:第一,国家偏向于采取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手段对付敌人,如摧毁或征服敌人。当前美欧在援乌对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及谋求将俄罗斯彻底击败的决心都昭示了这一点。第二,敌对双方对欧洲未来的安全前景都抱有更加悲观的预期,这种预期将导致双方更多地为战争的到来做最坏准备。第三,相对的军事力量比较变得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国家预判对方含有进攻性意图,军备竞赛将难以避免。第四,无限制地使用暴力以应对冲突或战争中的敌人的可能性大大提升。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北约不断加码的威慑东扩,包括波兰即将拥有的“双重能力”轰炸机^③,与俄罗斯方面频繁使用的核威慑话语,都已显示出敌对双方使用核武器作战的信号愈加明显。

从具体战略部署来看,北约提升威慑与防御能力的关键一环就是通过强化其在东部前沿国家的军事存在。为此,北约不仅升级了核威慑能力,同时还扩大了前沿威慑东扩的力度,如扩大中东欧国家的多国战斗群数量,以及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部署或升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等。在核威慑方面,北约暂未在中东欧国家直接部署核武器,但却通过增加和更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核武器,以间接方式强化对于中东欧国家的核保护。北约的核威慑依赖美国在欧洲国家部署的核武器以及相关盟国的贡献。各国为北约的核威慑任务提供双重作战能力飞机仍是实现战略核力量的核心,这些飞机可在不同的战备状态下发挥核打击作用。《每日电讯报》于2023年8月报道称,美国陆军已在英国皇家空军拉肯希思基地部署了两支能够携带核武器的F-35A战斗机中队。此次部署的战斗机隐身性更强,具有更远的航程,这些能力对于搭载核弹、实施战

^① Maria Malksoo, “NATO’s New Front: Deterrence Moves Eastward,” pp.531-547.

^② Ibid.

^③ 2024年,美国空军宣布F-35A战斗机获得携带核武器的资格认证,标志着它成为全球首款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五代机,也是首款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隐身战斗机。F-35A战斗机能够携带B61-12核重力炸弹,成为可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能力”飞机。

术核轰炸具有关键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由于对俄威胁感知下降,美国于2008年从英国撤回了核武器。^①此次部署系过去15年来首次。在常规军事威慑方面,根据2016年华沙峰会决议,北约于2017年7月开始在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毗邻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四国部署多国战斗群,分别由英国、加拿大、德国和美国领导。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2022年马德里峰会上,北约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再建四个多国战斗群,并同意将各战斗群的规模从营级扩充到旅级,这使得可调度地面部队数量翻了一番。^②多国战斗群中的部队每六个月轮换一次,并与东道国军队一起训练和行动。

四 北约威慑东扩与欧洲安全结构转型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约不断加码的前沿威慑力量,不仅彻底摧毁了冷战结束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脆弱的信任关系,同时也将欧洲对俄的恐惧情绪从中东欧扩散到全欧。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和恐惧无法消除或从根源上缓和,那么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就不可能真正摆脱敌意文化结构的束缚,这意味着双边无法走出安全困境,重回竞争和友谊文化。基于此,本文认为当前的欧洲安全结构在权力架构和权力分配两个维度上正在出现两种显著的转型趋向。

(一) 基本架构:走向对立的平行安全架构

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结构的特点是美国领导的北约和苏联主导的华约对立。这种两极安全结构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与人们期望相反的是,冷战终结并未给欧洲带来真正和平的安全环境。原因是苏联解体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东西欧之间的裂痕,并使得东西欧之间的对立不复存在,但相伴而生的后苏联空间国家对苏联后继国俄罗斯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也随之延续下来。因此,冷战后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弥合历史裂痕(地缘政治和文化意义),重建信任成为当务之急。欧洲迫切需要新的综合的安全架构来实现上述目标。构成欧洲安全框架的重要国际组织,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西欧联盟和欧盟。这些机构在欧

^① Danielle Sheridan, “US Fighter Jets Capable of Nuclear Bombing to Be Based in UK,” *The Telegraph*, August 30, 202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23/08/30/f35-fighter-jets-nuclear-weapons-raf-lakenheath-suffolk/>.

^② “NATO’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East of the Alliance,” NATO, July 8,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36388.htm.

洲安全架构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成效各不相同。

其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由成立于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以下简称“欧安会”)演变而来,彼时35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该文件就尊重彼此领土完整和人权等原则达成的安全共识,为冷战期间东西方加强对话奠定了基础。之后,该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的履行与落实。冷战结束改变了欧安会运作的安全环境。民主化和市场转型等议题成为欧洲安全的新议程。在此背景下,欧洲各国加上加拿大和美国在1990年的巴黎欧安会上通过了《巴黎宪章》,即《新欧洲巴黎宪章》。^①该文件开启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的新时期,勾勒了欧洲安全的新图景。正如宪章宗旨所强调的“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一个充满深刻变革和历史期望的时期在巴黎聚集。欧洲的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宣布,今后我们的关系将建立在尊重和合作的基础上”。^②需要指出的是,宪章所强调的尊重与合作建立在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之上。1995年,欧安会更名为欧安组织。与之前的欧安会一样,欧安组织的基础是“综合安全”愿景,其中包括人权和经济合作,以及传统的“硬”安全。然而,随着扩大后的欧盟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分歧重新出现,欧安组织发展成为冷战后新欧洲安全结构的核心支柱的希望破灭了。^③

俄罗斯将欧安组织视为欧洲主要安全合作组织,并一贯主张在其框架下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叶利钦就曾表达过俄罗斯期望建立的是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的覆盖全欧的新欧洲架构。^④该组织一度在解决地区冲突以及弥合东西欧之间的安全分歧,推动安全合作方面上发挥过独特作用。如1996年12月,欧安组织里斯本峰会通过了《关于21世纪欧洲共同和全面安全模式的里斯本宣言》,强调了欧洲的共同安全观。此外,该宣言还重申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核心安全原则,并再次强调了

^① “History of the OS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https://oestrigr.um.dk/en/osce/history-of-the-osce>.

^②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1990, Paris, p.3, <https://www.osce.org/files/l/documents/0/6/39516.pdf>.

^③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A Pillar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European Parliament Think Tank, September 2, 2021,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BRI\(2021\)696190](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hinktank/en/document/EPRS_BRI(2021)696190).

^④ “Boris-Bill Lett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ecember 6, 1994, <https://nsarchive.gwu.edu/document/16385-document-13-official-informal-no-248-boris-bill>.

巩固转型民主成果的重要意义。^① 1999年11月19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六届欧安组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峰会上,与会国家呼吁政治解决车臣问题并通过了《欧洲安全宪章》。^②

反观美国,一直支持将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架构内的核心组织。1994年,北约在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框架内确立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的初衷并未谋求将俄罗斯排除在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之外,而是希望通过该制度拉住俄罗斯,希冀俄罗斯能够平稳且彻底完成转型。1996年俄罗斯的顺利加入便证明了这一点。从欧洲层面来看,西欧与东欧国家在冷战后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克服分裂的安全架构。欧盟虽然制定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但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欧盟能够在维持和平行动、预防冲突和加强国际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③ 这意味着北约仍然且长期是欧盟国家最主要的安全保证。欧洲安全架构以及安全秩序走向将不可避免受到美俄关系的制约。冷战结束后一直到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周而复始的伙伴与对抗关系,与美俄关系的周期性变化可谓同频共振。

如果说2008年俄格冲突的发生促使美欧与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架构的理念和实现路径分道扬镳,那么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则标志着美欧与俄罗斯在伙伴与对抗之间周期性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这意味着冷战结束以来围绕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所建立起来的新欧洲安全架构已经失灵。此后,来自中东欧地区的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认知不断恶化,并且这些国家通过在北约和欧盟的政策游说和投票权,间接影响了两大组织的对俄政策定位。为了安抚和回应中东欧国家的安全诉求,在2016年华沙峰会上,北约史无前例地通过了部署前沿军事存在的决议,计划从2017年起向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派遣多国轮换部队,^④这标志着北约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防御战略从一以贯之的延伸威慑转向前沿威慑。2022年,北约将部署在中东欧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从四国扩大到了八国,规模也翻了一番。

在大国权力竞争和军备竞赛重回欧洲政治议程的背景下,一个新的覆盖了全欧范

^① “LISBON DOCUMENT 1996,”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December 3, 1996,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1/0/39539.pdf>.

^② “ISTANBUL DOCUMENT 1999,”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November 1999, <https://www.osce.org/files/f/documents/4/2/17502.pdf>.

^③ “The Shaping of a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 Diplomatic Serv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rch 28,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haping-common-security-and-defence-policy_en.

^④ “NATO 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 Lithuanian Army Newsletter, 2016, <https://kariuomene.lt/en/our-allies/nato-enhanced-forward-presence/23570>.

围且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所共同接受的安全架构形同“空中楼阁”。因此,在新的安全理念和机制引入之前,欧洲安全结构极大可能是走向以俄罗斯为代表和以美国及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平行安全体系。^① 前者的安全结构构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2023年3月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该文件将欧洲安全困境的形成归咎于西方的敌意和扩张性行为。^② 因此,在俄罗斯看来,如果西方不主动修正错误并做出改变的话,欧洲将不会有共同的安全架构,欧洲将继续分裂或分裂为西方和东方。^③ 后者仍将北约的集体安全视为欧洲安全架构的基础。进一步的证据是,俄罗斯于2021年12月单方面草拟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北约安全协定”亦体现了其对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欧洲安全结构的拒绝。^④

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安全实践互动已经显现出这一趋向。持强烈反俄立场的波兰利用其轮值主席国和东道主身份,在2022年12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举办前夕,拒绝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放签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回应了波兰这一举动,认为此举史无前例、具有挑衅性,并且与该组织主席国的地位不符。^⑤ 2023年的部长理事会于11月30日—12月1日在北马其顿召开,由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参加会议,5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和波兰)外长抵制此次活动,并由较低级别外交官代表出席。为了避免见到俄罗斯外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没有出席会议。^⑥

(二) 权力分配:均势重心东移与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杠杆作用提升

^① 国内欧洲学界相关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趋向。如冯仲平指出,此次冲突加剧了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俄罗斯的对立,重新强化了北约的价值,增大了欧洲提升自身防务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意味着以欧洲、美国与俄罗斯全面对抗为特征的欧洲新安全格局正在形成。参见倪峰、达巍、冯仲平、张健、庞大鹏、李勇慧、鲁传颖:《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3期,第38-67页。

^② 文件强调:“与欧洲国家形成新的共存模式的客观先决条件是欧亚大陆欧洲部分的人民和国家在地理上接近,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出深厚的文化、人道主义和经济联系。使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复杂化的主要因素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欧洲地区划定和加深分界线的战略方针,此举旨在削弱和破坏俄罗斯与欧洲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以及限制欧洲国家的主权,确保美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参见“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③ Andrey Kortunov, “Beyond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owards New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May 7, 2024,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ks-and-comments/analytiks/beyond-the-conflict-in-ukraine-towards-new-european-security-architecture/>。

^④ 孔田平:《欧洲安全秩序:历史、困境与选择》,载《世界知识》,2023年第10期,第14-19页。

^⑤ “Russia Blasts Poland’s Move to Deny Lavrov Participation in OSCE Ministerial Meeting,” TASS, November 19, 2022, <https://tass.com/politics/1539271>。

^⑥ Jakub Graca, Witold Rodkiewicz, “OSCE Ministerial Council in Skopje: Concessions to Russia in the Name of Preserving the Institution,”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December 8, 2023,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23-12-08/osce-ministerial-council-skopje-concessions-to-russia-name>。

回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初期的欧洲安全结构,主导以及参与欧洲安全架构的主要行为体包括德国、法国等西欧大国,俄罗斯、美国,以及欧盟、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地区组织。主导国家是美国,影响安全架构的几组互动关系主要是美国与俄罗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和北约。其中,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互动在安全架构中居于主导性地位,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国家间关系互动具有系统性影响。原因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感知和利益认知直接决定了冷战后北约的战略定位,进而影响着俄罗斯的战略反应。譬如,冷战后初期,美国克林顿政府不再将俄罗斯视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威胁,故而对俄谋求建立伙伴关系,以推动俄罗斯的欧洲化转型顺利且稳定地推进。在此背景下,摆脱苏联控制的中东欧国家也因美俄关系的重启与缓和,其政治地位受到显著影响,在美国欧洲战略中的地位降至俄罗斯之下。需要强调的是,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关系互动也是欧洲安全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说美俄互动对地区内国家互动带来的是一种系统性压力的话,那么中东欧国家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与利益认知具有塑造作用。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安全和利益认知又构成它们全力以赴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外交思想基石。随着多数中东欧国家获得北约和欧盟成员国身份,上述影响欧洲安全框架的三组关系便转化为美俄关系、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东部伙伴国家关系。原因是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的中东欧国家与这两个组织的整体利益具有一致性,同时也意味着以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等为代表的一批中东欧国家不再是夹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该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真空被北约和欧盟所填补,随之而来的争夺焦点转移到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六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以及外高加索三国)。在“俄罗斯恐惧症”的强烈驱动下,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一直谋求推动北约和欧盟持续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扩张,如此可以避免本国长期处于北约东部前沿的不安定地带。自北约东扩进程开启到 21 世纪以来发生的几次重要地缘政治冲突,中东欧国家均在其中扮演了安全焦虑扩大器和传播者角色。

从欧洲安全结构中的权力均势变化来看,为维持对欧洲的主导权,西欧大国在冷战后初期直至 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重返中东欧以及北约前沿威慑东扩之前,一直作为美国对俄战略的平衡之轮,欧洲安全结构中的均势重心也聚焦于美国与西欧大国和俄罗斯几个权力主体。不可否认的是,2017 年以来欧洲安全结构的均势重心加速向中东欧地区偏移。直到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美欧愈发相信俄罗斯方面的威

胁是现实的,正如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Giorgio Cafiero)刊文所指出:“如果乌克兰在危机中失败,下一个战场很有可能就是摩尔多瓦。”^①由于乌克兰处在缓冲地带及其在此次危机中扮演的抵抗俄罗斯的代理人角色,这将为乌克兰未来参与新欧洲安全结构提供无可替代的政治资本。从地缘政治冲突中心引发的外溢效应是,与乌克兰西部相邻的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将得到显著提升。该地区的仇俄反俄国家将与乌克兰一道成为美国对俄战略的新的平衡之轮。不论谁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中东欧地区的格局在短期内已经无法回到危机之前。换言之,美俄结构层面的关系缓和,也无法弥补和安抚多数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强烈安全焦虑。这种安全焦虑感辅之以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将使得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的新欧洲安全结构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并且,可以确定的是,这种角色是基于已经彻底内化的敌人身份之上,在这种敌意主导的文化结构被部分消除和降解之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重回伙伴关系轨道是不可能的。正如俄罗斯学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所指出的,在跨大西洋关系框架内,美国越来越强,欧洲越来越弱。北约的相对实力正在增强,而欧盟正在搁置其战略自主的野心。在欧盟内部,新欧洲和旧欧洲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向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的方向转变。^②

五 结语

威慑与防御作为北约发挥集体安全保证有效性的两个核心战略目标,自北约成立以来一直贯穿在北约不同时期的战略定位之中,区别在于前者或后者在某一时期内压倒另一方占据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瓦解,北约的战略目标转向以防御为主导,辅之以威慑力量,以确保防御力量的有效性和坚实性。但好景不长,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在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随着1999年北约东扩开启和科索沃战争爆发产生的观念分歧,双边关系开始在合作伙伴与敌人之间徘徊,合作伙伴仍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战略互动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向是在2008年俄格冲突之后,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合作伙伴让位于敌人身份,并开始在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欧地区的北约老成员国才

^① Giorgio Cafiero, “If Kyiv Fell, Would Moldova Have Been Next?”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 March 17, 2024,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russia-transnistria-ukraine/>.

^② Andrey Kortunov, “Beyond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owards New European Security Architecture”.

真正开始接受中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散布的“俄罗斯威胁论”。此后,北约完成了从延伸威慑到前沿威慑的史无前例的战略东进,这也自然而然地使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彻底陷入难以甚至无可挣脱的安全困境。回溯上述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困境的生成过程,引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谁是安全焦虑的扩大器和传播者,那么谁或许就是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困境生成的“始作俑者”。正如本文试图补充的一个新的理解路径,即作为单元层面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才导致这些国家在入约加盟之后,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推动北约威慑东扩的“使命”,这种“使命”是地理分裂和历史创伤带来的,无法在短期内消除。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既反映了美俄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同样也折射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难以弥合的安全观裂痕。此次危机同时也为中东欧国家进一步呼吁和推动北约威慑东扩提供了证词,但随之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也更加严重。此外,本文认为,这场危机已对欧洲安全结构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构成安全结构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分配维度上。在权力架构上,欧洲将可能继续分裂为东方和西方,欧洲安全架构也将迈向以美欧为代表的一方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另一方的平行安全体系。从欧洲安全秩序中的权力均势变化来看,与乌克兰西部相邻的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地位将得到显著提升,美国欧洲战略的平衡之轮也将更多地转向该地区。

(作者简介:王弘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责任编辑:张海洋)